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管理研究丛书

社会治理创新 发展报告（2016）

主 编 姜晓萍
副主编 夏志强 李强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管理研究丛书

社会治理创新 发展报告（2016）

主 编 姜晓萍
副主编 夏志强 李强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报告. 2016/姜晓萍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2

(社会管理研究丛书)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300-23877-7

I. ①社… II. ①姜… III. ①社会管理-研究报告-中国-2016 IV. ①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6778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管理研究丛书

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报告 (2016)

主 编 姜晓萍

副主编 夏志强 李强彬

Shehui Zhili Chuangxin Fazhan Baogao (2016)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7.5 插页 1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9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美国公共治理专家理查德·C. 博克斯 (Richard C. Box) 曾说：“如果说 19 世纪至 20 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 21 世纪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创建的复兴实验过程。”事实上，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公共管理领域创新的重心已由追求政府管理的高绩效转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公共治理中的政府权力本位开始转向公民权利本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性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由此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热点议题。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成就突出，但社会建设不足和发展相对滞后越来越影响我国整体发展战略进程的推进。早在 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此回应我国社会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从此，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地方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在社会管理新格局构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基层社区协同管理等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下,在社会治理方面最紧要的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和实现社会治理创新。而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就“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为此,必须把握好社会治理创新的两条实现路径:一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二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此二者如同社会治理创新之两翼,既相辅相成,又缺一不可。

“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我国新时期复杂形势提出的重要命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五中全会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最新规划,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后理论的再次提升。

在探寻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既有理论界广大专家学者展开理论探讨的百花齐放,也有实务界的孜孜以求。与这众多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一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集中相关研究力量,整合中心相关研究资源,编著了《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报告(2016)》一书。该报告围绕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中的基础理论研究、制度完善、地方实践与经验、重点领域或重大问题的发展动态等开展对策性、前瞻性研究,力求发挥中心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决策和政策咨询作用。

该报告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了四川省社科联、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大学社科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意。由于水平有限,报告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新型城镇化与社区发展：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基于理论文献的模型探究	左世翔 (1)
新媒体时代下公众环境抗争及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孙壮珍 (19)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腐败风险及其内在机理	张仁枫 (36)
强制拆迁废除的治理逻辑	刘 锐 (53)
特许经营管理模式的风险分析及应对策略 ——以 PPP 模式为例	刘 宇 康 健 (68)
基于 TQM 理论的四川省市域社会治理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范逢春 李晓梅 赵文彦 (86)
社区融合的现状测度与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成都市锦江区 1 409 个样本数据分析	郭金云 朱筱屿 (109)
加强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风险沟通	刘智勇 (131)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协同治理模式的建构与创新 ——以四川省为例	苗建萍 (149)
转型期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研究	王 怡 (167)



面向政府治理的虚拟社区健康评估研究 王 莉 叶昀昊 (184)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分析 吴 敏 张 倩 (213)

地方政府项目开发中环评阶段监督机制专题研究报告

朱奎彬 杨 柳 (225)

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调查报告

黄 进 陈 序 于倩倩 张 辉 何玉梅 (241)

社区治理创新的调查与思考：以什邡为例

张正芬 郑春燕 罗正祥 (263)

新型城镇化与社区发展：新经济 社会学的视角

——基于理论文献的模型探究

左世翔*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城镇化的内涵可追溯至马克思的相关研究，紧随其后的众多学者陆续深入探讨了城市化、城镇化的相关问题。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城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城镇化已从单一的经济议题转向了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环境资源学等综合议题，丰富的研究成果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吸收。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人口分布方面，2015 年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 137 462 万，比上年末增加 680 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77 116 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6.10%，比上年

* 左世翔，西华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社区发展。



末提高 1.33 个百分点。在人口就业方面，2015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 451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0 410 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 312 万人。^① 然而，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现。例如，城镇化的内部呈现出二元分割现象^②，即农民工群体与当地城镇居民间的各项差异表现为一种顽固的结构性矛盾。另外，“大城市病”也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城市拥堵、环境恶劣、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也较为明显。由此，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并得到提倡。

新型城镇化的优势在于其独特的中心与明确的目标。新型城镇化的中心在于看到了“人”的重要性，强调了城镇化的核心是人。传统城镇化过多地关注了城镇化的增量和速度，新型城镇化则进一步提出了对质量的较高要求。^③ 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即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补偿农村土地经济、合理配置各类资源。^④ 为此，基于新型城镇化对于传统城镇化理念的改善，这里有必要通过梳理与评述城镇化的相关理论文献，结合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新型城镇化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展开比较与分析，从而为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对策与思路。

（二）问题的提出

一方面，新型城镇化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文明现代化、生产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因社会、文化、历史及经济因素差异而各不

① 参见《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02-29。

② 参见尹虹潘、刘渝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城市化演进路径》，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5）；李燕凌、彭园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政策研究》，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3）。

③ 参见范双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谭崇台、马绵远：《农民工市民化：历史、难点与对策》，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

④ 参见高新才、李笑含：《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对策分析》，载《兰州学刊》，2016（6）。

相同，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及国际化等概念的提出，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当前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新经济社会学推进了城镇化中的社区发展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学的复兴，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围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到了应用，这一系列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为现代城镇化研究带来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可以说，今天的城镇化研究已不能由经济学独门担当了。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的研究将立足于社会资本与城镇化社区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考虑到这一关系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学范畴的同时，努力寻求来自经济社会学的有力支撑。概言之，本文将采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视角来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社区发展问题。这将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也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于是，这里存在三个核心问题：其一，新型城镇化如何依托社区发展实现具体目标，即社区发展在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其二，社会资本在社区发展中有何作用，即社会资本作用下的新型城镇化社区区别于其他社区所独有的发展特征、发展模式及发展路径是什么；其三，社区发展又在社会资本作用下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产生何种影响，即社区发展是否充当了中间变量或发挥了中介效应。因此，以解答这三个核心问题为目的，一方面，需要梳理城镇化与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文献，构筑起合理的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另一方面，本文将从社会资本角度解析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社区模式，从而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并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可行的建议与思路。

二、传统城镇化研究

（一）城镇化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城镇化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城镇的大量出现和扩张是



工业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亦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必然。早期的城镇化学者,如塞德拉(A. Sedra)、弗里德曼(J. Friedmann)等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人口和地域面积的延伸过程,并伴随着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在农村的扩散。哈维(D. Harvey)^①、卡斯特尔斯(M. Castells)等其他学者认为,城镇化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宏观经济层面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会影响经济增长、人口流动、物资分配及价格水平等多个方面。斯科特(A. Scott)、拉姆帕德(E. E. Lampard)等学者还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关关系,即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具体体现。^②

目前,学术界对于城镇化的概念已有共识,即城镇化是一个综合的变迁过程。从产业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的过程;从社会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从散居社会向群居社会的转变过程;从生活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从农耕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具体而言,城镇化的概念又体现为四个方面的城镇化,即农村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城镇化。^③总之,城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很强的延伸性和外部性,既是有形实体的物化过程,还是无形抽象的精神过程。^④

(二) 传统城镇化理论综述

1. 传统城镇化研究的演进

传统城镇化的研究历史较长,可以说,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① D. Harvey, "Characteriz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A template for landscape planning,"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8, 87 (3): 210-222.

^② E. E. Lampard, "Strategic decisions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Third World Planning*, 1994, 16 (2): 103-116.

^③ 参见李杰、张光宏:《农村土地制度与城镇化进程:制度变迁下的历史分析》,载《农业技术经济》,2013(2)。

^④ 参见田鹏、陈绍军:《“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研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判》开始，围绕城镇化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相应研究从城镇化的现象开始，针对其内涵、形式、动因及结果等展开了讨论。哈格斯特兰德（T. Hagerstrand）、佩鲁（F. Perroux）、弗里德曼等人通过提出空间扩散、增长极及“核心—外围”等理论，将城镇化解释为一种空间扩散现象。戈特曼（Jean Gottmann）通过大城市圈的概念分析了大城市群现象。诺瑟姆（Ray M. Northam）研究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从经济增长的视角解释了为什么要实现城镇化。麦吉（T. G. McGee）从城乡一体化及区域经济的视角解释了城镇化的内涵。国内学者丁金宏^①、杨云彦等^②、刘岱宁等^③及荆文锴等^④还基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研究了中国城镇化的特有模式。

2. 早期城镇化理论

聚集与扩散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是早期城镇化理论的代表，这一理论认为小城镇的形成受到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双重影响。具体而言，由于自然人与法人的聚集，即人口与企业的空间集中，这会产生出经济与不经济两种结果，即形成小城镇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从而既促成了小城镇的产生但又限制了小城镇的边界。詹茨（C. A. Jantz）认为，城镇化的关键是中心区域的扩散与聚集能力，城镇中心的资金、技术向外扩散，周边区域的人口、资源向内聚集，内外交流使得城市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一理论又衍生了一些分支理论。以科巴西（Le Corbusier）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理论学者，强调了城市的集中发展思路，他们看到了聚集效应的优势。以昂温（Unwin）为代表的卫星城市理论学者，则看到了城市过度集中的弊端，认为大城市必须要通过发展卫星城来疏解“大城市病”，强调了扩散效应的作用。可见，聚集与扩散理论本身具有两面性，随着现

① 参见丁金宏：《论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与机制——基于199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1993（1）。

② 参见杨云彦、陈金永、刘塔：《中国人口迁移：多区域模型及实证分析》，载《中国人口科学》，1999（4）。

③ 参见刘岱宁、曹青、耿明斋：《河南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模式》，载《经济经纬》，2014（3）。

④ 参见荆文锴、张耀军：《新型城镇化中流出人口的管理与服务》，载《宏观经济管理》，2016（2）。



代城市的快速发展,这一城镇化的早期理论渐渐被新的理论补充、替代。

3. 中心城市理论

中心城市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包括城市中心地理理论和城市增长极理论两个分支。一方面,城市中心地理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看到了经济活动对于城镇的形成、扩展及分布的影响,强调了市场中心(城镇中心)的观点,并从区域影响的角度阐述了中心城镇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城市增长极理论的提出者皮罗(Peirluo)认为经济增长的地理中心能够带动周边地域的共同发展,例如,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加大投资与集中建设等措施,引导和管理城市增长极,从而达到加速城镇化进程的良好效果。因此,对于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将形成城镇化的新的地理中心,并影响周边区域、行业及人的观念的发展。

中心城市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城市的发展,尤其在中小城镇的城镇化问题中,依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4. 中小城镇理论

中小城镇理论相比于之前的理论,吸取了大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试图回归城乡协同发展这一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现实问题。这一理论尝试解答如何通过城镇化改变人的生活这一核心问题,其中,田园城市理论与地区城市理论具有一定代表性。

霍华德(Howard)最早开始反思“大城市病”,并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莱奇沃思(Letchworth)、威奇(Witch)等学者也认为,城乡隔离、城乡对立使得城市与农村走向了相反的两个极端。随后,社会城市、城乡综合体、城市群及田园城市等概念被提出,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生态城市发展观念。这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城镇化思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如艾伯蒂和沃戴尔^①、潘内尔^②等)的认同。

后来的芒福德(Lewis Mumford)等人从城市与乡村的网络化影响

^① Marina Alberti, Paul Waddell, “An integrated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imulation model,” *Integrated Assessment*, 2000 (1): 215-227.

^② Clifton W. Pannell, “China’s demographic and urban trends for the 21st centur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3, 44 (7): 479-496.

角度，提出了地区城市理论。在他们看来，城镇与城镇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相互影响深远。事实上，城乡之间组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有机整体，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产业方面的良性互动，将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最终实现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合理化。

三、新型城镇化研究

（一）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兴起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围绕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问题，学者们针对其概念内涵、农民工、失地农民、人口增长及实现模式等展开了研究。单卓然、黄亚平就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进行了阐述。^① 埃德曼（John Edmann）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了中国城市与农村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城镇化中的社会服务均等问题。岳文海针对中国城镇化当中的就业、融资及环境难题，从政策制定、建设规划、产业支撑及民生环保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沈清基将生态文明同新型城镇化相结合，探讨了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智能模式及生态保持等问题。^② 张本效、郑杭生从耕地保护与土地权益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村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形式，即“就地上楼”的社区模式。^③ 其他学者如简新华^④、刘传江^⑤、欧阳

① 参见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载《城市规划学刊》，2013（2）。

② 参见沈清基：《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载《城市规划学刊》，2013（1）。

③ 参见张本效、郑杭生：《“就地上楼”：新型城镇化社区的实现形式》，载《甘肃社会科学》，2014（5）。

④ 参见简新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载《求是学刊》，2011（1）。

⑤ 参见刘传江：《迁徙条件、生存状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路》，载《改革》，2013（4）。



力胜^①及张贡生^②还研究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

目前,新型城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模式研究、特点研究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几个主要方面。

(二) 新型城镇化的模式研究

对于新型城镇化模式的研究,大致分为大城市模式、中小城市模式及城乡统筹模式三类。

大城市模式亦包括城市群模式,主要探讨大城市依托于集聚效应、规模收益及辐射效应等优势,带动区域经济整体进步的城镇化路径。众多学者(如李富田、李戈^③)的研究认为,只有大城市能够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实际上只能发挥一定的过渡作用,缺乏可持续的吸纳空间。

中小城市模式却有着与大城市模式截然不同的观点。俞宪忠^④、顾建光^⑤等学者认为,由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地方经济微观主体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就地上楼”“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是中国当前农村人口由农业向工业流动的最直接和最常见的方式,因而依托中小城镇的城镇化才是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城乡统筹模式则采取了折中的观点,认为城镇化并非简单的农业非农化,而是一个关系城镇与农村双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⑥城乡势必统筹一体,同步发展,以便缩小差距、优势互补,这也将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思路。^⑦

① 参见欧阳力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

② 参见张贡生:《“农民工市民化”还是“农民市民化”?——基本概念辨析》,载《经济与管理》,2016(3)。

③ 参见李富田、李戈:《进城还是进镇:西部农民城镇化路径选择——对四川省31个镇、村调查》,载《农村经济》,2010(4)。

④ 参见俞宪忠:《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载《人口学刊》,2013(6)。

⑤ 参见顾建光:《依托“中心镇”城市化的新策略研究》,载《经济体制改革》,2015(2)。

⑥ 参见程必定:《区域的“城市性”与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1)。

⑦ 参见仇保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辨——“C模式”:超越“A模式”的诱惑和“B模式”的泥淖》,载《城市发展研究》,2009(1);龙奋杰、王爵等:《基于资源可达性的贵州省新型城镇化模式》,载《城市发展研究》,2016(3)。

（三）新型城镇化的特点研究

新型城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包括了以人为本、产业协调共进、体系优势互补及生态质量提升四个方面。^①

首先，以人为本强调了城镇化过程中人的重要性，要求充分尊重并满足人的各项社会、经济及文化需求。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人口城镇化、就业城镇化、教育城镇化、社会保障城镇化以及医疗卫生城镇化五项基本内容。^②

其次，产业协调共进体现为“产城融合”，并进一步要求城镇的生产与生活职能能够相互协调。由于城镇人口必须依托一定的产业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因而只有产、城、人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③

再次，体系优势互补体现为城镇化所形成的各类城镇间的关联互动，是新型城镇体系动态发展的结果。由于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具有多样性，加之所产生的城镇在规模、产业、环境及经济等诸多方面又各有优势，因而相互促进改善、相互弥补不足势必成为新型城镇体系内部的改善机制。

最后，生态质量提升表现为城镇化的过程不再对环境与资源产生过度的破坏，而是将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思路应用于城镇化建设当中，这将有助于形成宜居宜业的新型城镇。^④

（四）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① 参见岳文海：《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② 参见彭永涛、杜建国、罗建强：《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城乡配送网络优化研究》，载《软科学》，2016（5）。

③ 参见鹿媛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产城一体化探索》，载《现代管理科学》，2016（2）。

④ 参见李江云、石榴花等：《基于宜居宜业评价的“后棚户区改造”规划对策——以乌海市乌达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载《城市发展研究》，2015（11）。



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经济近 40 年来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点。^① 主要观点有三个：其一，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新的需求。很显然，新型城镇化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农民职业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市民不再是简单的“农转非”身份变更，而是更加强调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将更加有助于创造城市消费需求和改善市场消费结构。其二，新型城镇化创造了新的供给。众所周知，新型城镇化带来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相较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更具创新性、科技性、环保性及战略性，这种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发展路径，将奠定经济更长远发展的产业基础，也有助于市场供给量的增加和结构优化。其三，新型城镇化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② 新型城镇化需要克服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的众多难题，如“大城市病”、资源环境破坏、城乡产业结构失调、城乡二元经济差异等。由于新型城镇化强调了以人为本、城乡统筹、节约集约、和谐发展的基本理念，因而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城镇化模式。^③ 这一模式能够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建设与农村发展、产业转型与人口就业等多项关系。

另一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主要观点包括两个：其一，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物质基础。有学者（如戈大专等^④、丁浩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作用，且经济发展在质和量上的积累是新型城镇化得以开展并实现的最重要的基础。其二，经济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由于城镇化是一场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重新调整与正和博弈^⑤，

① 参见何立春：《新型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经济发展》，载《财经问题研究》，2015（5）。

② 参见程子腾、严金明：《新型城镇化下低碳经济发展研究——以柳州市为例》，载《现代管理科学》，2016（2）。

③ 参见丁浩、余志林、王家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 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载《统计与决策》，2016（11）。

④ 参见戈大专等：《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研究进展与展望》，载《经济地理》，2016（4）。

⑤ 参见于立：《“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和理论探索》，载《城市发展研究》，2016（1）。